

苏俄史

下 册

M·K·杰瓦诺夫斯基 著

蔡汉敖 王克强 等 译

张 扬 邢向长 校

内 部 交 流

教 学 参 考

山西师范学院

《苏俄史》 翻译组

第四部分

斯大林革命

第十二章

争夺列宁的衣钵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论争

尽管列宁强调纪律与团结，布尔什维克党却远不是协调一致的。事实上，内部小集团的斗争一直不断进行。革命后的第一个派别组织，就对列宁愿意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提出批评，这个组织由布哈林1918年组成，以“左派共产主义反对派”著称。1920年，一些著名的共产党员，其中大部为工会领袖，以劳动人民委员A·G·什利阿普尼柯夫和社会保险人民委员阿列克山德拉·柯仑泰为首，组成所谓的“工人反对派”。这一集团批评官僚主义的工业管理，赞成工团主义的解决办法，主张建立全俄生产者大会管理经济。1921年3月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严厉批评了“工人反对派”，谴责一切“派别活动”都是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1919—22年期间，一个由党的高级官员组成的名为“民主集中派”的集团，要求民主集中制应该民主较多，集中较少，赞

成党内制度应该监督较少而自由较多。他们也是由于列宁的创议而遭失败。

列宁病情恶化时，派别倾向再次表面化。列宁生前的最后两年，这位疾病缠身的领袖指为党领导中最有能力的两个人物——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已经暗暗地展开激烈斗争。这一斗争既是个人性格之间的冲突，又是思想观念和行动方式上的对抗，因此应当对这两个竞争对手的背景做一简要考察。

托洛茨基的资本

列昂·托洛茨基1879年生，原名列夫·达维多维奇·布朗斯坦因。他出身于乌克兰赫尔森地区一个富裕犹太农民的家庭。他19岁成为革命者，不久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亚，随后逃往国外。正是那时，他采用了托洛茨基的名字。1902年，他在伦敦遇到列宁。列宁对他的思想活泼和热情奔放印象很深，于是邀请托洛茨基一起在“火星报”编辑部工作，他以笔名彼罗（意为笔）为火星报撰写文章。尽管同列宁早期就有这种十分密切的交往，托洛茨基很长时期都对他采取批评态度。他摇摆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长达15年之久。1904年，他竟达到尖锐谴责列宁的集权主义倾向的程度。托洛茨基争论说，这些倾向总有一天会导致这样一种情况：“党组织取代党本身；中央委员会取代党组织；最后独裁者取代中央委员会。”

1905年革命期间，托洛茨基作为圣彼得堡苏维埃付主席、随后又作为主席而第一次崭露头角。他又一次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亚，并再次逃往国外，大部时间住在奥地利和法

国，最后住在美国。沙皇制度垮台后，托洛茨基从美国回到俄国，只是这时，1917年的夏季，才正式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很快被选入中央委员会。1917年9月，科尔尼洛夫图谋政变未遂之后，布尔什维克赢得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多数，托洛茨基被选为苏维埃主席。1917年10月，他同时成为准备夺取首都权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在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中，托洛茨基任外交人民委员。他反对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平条约，主张“既不和平，也不战争”，但最后投票同意列宁。从1918年直到1925年，托洛茨基一直是国防人民委员，是红军的首要组织者，内战期间的领导者之一。

托洛茨基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他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个主要领导人，重要性仅次于列宁。此外，他才华横溢。他是个具有吸引力的演说家，精力充沛，才智机敏，又是多产作家，写过许多书籍、小册子和论文。但是，他的这些气质同时伴随着明显的弱点：爱好虚荣，以自我为中心，自信达到傲慢的程度，这使许多同志都不喜欢他，不信任他。他爱好戏剧性的姿态，表现高傲，憎恶日常公事，对于目的缺少坚持精神，不能全神贯注。

斯大林的资本

托洛茨基的主要竞争对手约瑟夫·斯大林，原名约西卜·朱加史维里，1879年生于第比里斯附近的哥里村。他同托洛茨基对比的鲜明，是人们难以想象的。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一个嗜酒成性、乐于冒险、地位低微的鞋匠的儿子，他母亲笃信宗教。在她的坚持下，他被送到第比里斯东正教神学

校。由于他的革命世界观和革命活动，1898年他被学校开除。1903年，朱加史维里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以后采用笔名斯大林，意为“钢人”。

在1913年以前，斯大林作为积极追随者，主要在外高加索地下组织进行革命工作。1907年，他组织了几次对银行的抢劫，或者说“没收”，给布尔什维克党财务提供经费。1912年布拉格会议后，斯大林被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共同推选进入党中央委员会，他们两人都迫切需要一个非俄罗斯少数民族的、精力充沛的合作者。斯大林具有这些品质，享有声望。1912年11月，他在克拉科夫访问了列宁，并在维也纳度过几个月。正是在这一次旅行期间，斯大林在布哈林的帮助下，写出了他的早期理论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

根据《革命笔记》的作者和这本书忠实的大事记编者N·N·苏哈托夫记载，1917年春，斯大林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时，仍然仅仅是个“灰点”，微光一闪而逝，踪影无存。

从1917年到1923年，斯大林是民族人民委员，1919年到1923年是国家监察人民委员。第二个职务的目的在于防止行政机构的官僚主义化。这两个职务结合起来，使斯大林获得了大量的政治和行政的经验。只是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造成危机之后，他才成为列宁的亲密同事。斯大林不象托洛茨基，坚决支持列宁的立场，因此赢得了他的信任和感激。在布尔什维克政变前夕组成的政治局里，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两人从一开始都是政治局委员。

内战时期，斯大林像许多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一样，是地位很高的政治委员，而承担这一职务，则是国防人民委

员托洛茨基的下级。1919年，斯大林属于伏罗希洛夫指挥的红军军团，这个军团成功地保卫了伏尔加河畔的察里津（后改名斯大林格勒，现名伏尔加格勒）。正是这时，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第一次发生严重不和。1920年苏波战争期间，斯大林同布琼尼的第一骑兵军在一起，再次任该军第一政委。在当年8月那些严酷的日子里，国防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原来是希望在华沙给波兰人致命一击，但斯大林却劝说布琼尼去进攻里沃夫，而未去攻打华沙。华沙之战使红军遭到惨败，斯大林对这一惨败所负的责任，成了编写苏维埃政治和历史的棘手的争论问题。

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对比研究

很难想像两种性格的对比有比这更鲜明的。托洛茨基饱学而遍游各地，见多识广，世界为怀，热情奔放，性格外向，辞藻丰富，光彩耀人。而另一方面，斯大林似乎显得土气、内向、沉默寡言而迟钝，对肤浅的观察家来说，显得缺少显著才能。托洛茨基既是光辉夺目的作家，又是机智动人的演说家。斯大林在文字和语言方面的表现，则相当粗鲁而单调。托洛茨基一表人材：脑宽、额高、眼睛黑亮，满头鬃似的黑发。斯大林看来不怎么显眼：个子矮小，脸上有麻子，曲臂、黑齿、黄眼，蓄着胡须，带着半羞怯、半诡秘的微笑。他有浓重的格鲁吉亚口音，而且不像托洛茨基，他不会讲外语。托洛茨基是个易兴奋而神经质的知识分子，是个因一时冲动会立即做出反应的富有灵感的人，他感情经常起伏波动。另一方面，斯大林则不易激动，坚定，有条理，能够

冷静判断，耐心规划，做事谨慎。

1922——23年，这两个人都崭露头角成为争夺苏俄领导权的主要竞争对手。要当列宁的继承人，他俩各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托洛茨基尽管在革命和内战期间起了作用，却是后来才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1917年7月以前，他一再同列宁争论，在某些问题上，包括对列宁的专断和潜在的独裁领导方面，抨击过列宁。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谈判时期，他同列宁分裂。他不听列宁的劝告，挑起格鲁吉亚问题，并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攻击斯大林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他两次拒绝作列宁的副手担任人民委员会议副主席。另一方面，斯大林在列宁生病以前，从未卷入同列宁的争论，但在列宁遗嘱中却受到强烈的摒弃。

“三驾马车”对托洛茨基

1922——24年那些严酷的年头，托洛茨基最初看来好象是列宁的当然接班人，但正如大家注意到的，他常常生病而不在莫斯科。由于极端的自我中心思想和极端的自信，他几乎没有亲朋密友，而且又不在意公众关系。另一方面，斯大林花了很多心血来培植政治盟友，小心操纵党的机器。斯大林的对手是孤家寡人，而他自己则同政治局的两个领导成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携手合作。在制定政策的七人最高机构中，这种情况自然而然地使他们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因为通常只有五个人出席会议：列宁生病，托洛茨基经常缺席。

季诺维也夫出身犹太血统的中产阶级，是共产国际主席，因此在全世界革命人士中享有很高威信。他是彼得格勒

苏维埃主席，在国内同样有着重要的权力基础。他是个熟练的新闻记者，也是一个热烈的演说家，善于蛊惑人心，但缺乏有条不紊地进行工作的能力，办事也缺乏坚持精神。季诺维也夫的知心朋友L·V·加米涅夫，有着类似的背景。加米涅夫处于列宁之下，是人民委员会付主席和莫斯科苏维埃主席。他擅长日常行政工作，而这却是季诺维也夫的弱点，但没有什么写作和演说的才能。就某一点讲，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相辅相成，互补不足，很快地成为苏维埃政治中的卡斯特和波勒克斯（译注一）。然而，他二人缺少托洛茨基那种很高的智力天赋。这三驾马车的成员——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1903年起就参加了列宁一派，而托洛茨基相对地说是新来者。所有这三个人都可以夸耀先前英雄时期的重大成就，然而比起托洛茨基却都相形见绌。自卑感似乎促成这三驾马车形成一个战术联盟，来反对他们又害怕又嫉妒的那个人，指责他怀有“波拿巴主义”的野心。所有这四个竞争者，大概都梦想成为列宁的接班人，但是谁也不愿公开承认怀有这样一种野心。他们装作是希望把这位伟大领袖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应用于苏维埃俄国的当前情况，而不是自己要继承列宁的衣钵。

不断革命论

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可以归结为两个战斗口号：“不断革命”对“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不

（译注一）双子座的双星。

断革命”这个词，最初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译注二）中偶然用来描述革命骚动从一个国家扩散到另一个国家。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亚历山大·海尔芳德（用笔名帕尔乌斯）在为托洛茨基一本论述1905年初俄国国内形势的小册子作序时，第一次仔细阐述了这一概念。据帕尔乌斯说，俄国无产阶级开始进行一场革命，虽则起初会是资产阶级革命，但不会就此停止，而会继续“不断”进行，直到变成一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托洛茨基在他写的斯大林传中承认这一概念抓着他的思想。

他受帕尔乌斯启发，在1905年出版的《我们的革命》论文集和1906年出版的《成绩与展望》一书中发展了他的思想，当时，俄国社会主义者大多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教义。认为在他们的落后国家里，即将到来的革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会局限在资产阶级阶段。反之，托洛茨基认为这种思想流派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过分拘泥于文字和形式。由于考察1904——05年事件的结果，托洛茨基得出结论。俄国资产阶级如此软弱，以致不能在值得一提的时间内保持政权。虽然，未来革命在开始阶段就历史意义说确实可能是资产阶级的，但它必须由工人阶级来完成，革命的动力将推动它超越第一阶段。俄国工人阶级一旦掌握政权，由于本国资产阶级软弱，将不得不把革命的进程推进到下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因此，托洛茨基认为，甚至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开始之前，俄国将从革命进程的较低阶段跃入较高阶段。

俄国注定要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先驱的原因，是

（译注二）应为《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

基于它的历史特点：它的中产阶级独具的惰性，保守主义，胆怯以及它对具有无上权力的国家和外国资本的依赖。考虑到俄国资产阶级和它政治上的赞助者自由主义分子昏沉被动，唯一能够成为夺取和保持政权的力量，只能是坚强、年轻、生气勃勃的俄国工人阶级。然而，因为俄国仍然是个不发达的农业社会，15,000万人口中，工人只有300万，工人政府无法长期生存下去；它会很快被国内的反革命推翻，或者被外国的干涉颠覆，或者被这两种力量共同打倒。因此，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只有扩展到其它比较先进的工业国家才能得救。托洛茨基给他的“不断革命”下的定义是，作为一个进程，“它下面的每一个阶段都仰赖前面一个阶段，只有阶级社会完全消灭，这一进程才会终止”。在这种情况下，俄国革命的星星之火最终将点燃世界范围的革命烈焰。俄国的一国革命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最终成为世界革命。托洛茨基认为，俄国的原始经济，还没有成熟到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西欧却足够成熟。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取得国内政权后，为什么应该立即将它的革命福音传播到西方、特别是德国的原因。这将保证俄国有充足的手段在自己国内继续发展社会主义。

在1917——19年那些生死攸关的年头，革命起义在俄国、德国和匈牙利爆发时，托洛茨基的理论看来对事件发展做出了精确的预见。但是，1920年8月中旬，红军向西的进攻在华沙的大门口遭到粉碎，连锁反应就打断了。然而，对托洛茨基来说，西方资本主义的复苏只是暂时现象，仅仅是一种“业已腐烂的稳定”。尽管大量证据刚好相反，尽管宣布了新经济政策，托洛茨基继续以他特有的热情和才华宣传他心爱的思想，认为他的构想符合列宁的教导和实践。然而，越

来越明显，托洛茨基的理论对党的大多数领导人格格不入，更不用说为7年战争、紧张努力和饥饿搞得精疲力竭而渴望恢复正常生活的苏维埃人民群众了。

一国建设社会主义

斯大林由于想要继承列宁，欢迎有机会公开辩论关系苏维埃内外政策的根本问题。前面已经讲过，列宁逝世后，每一个权力竞争者都特别注意为自己确定一个“优秀的列宁主义者”的头衔，强调自己对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已故缔造者的忠诚。斯大林现在有机会证明他是可以与托洛茨基匹敌的理论家，他将永远执行列宁的教导。经过仔细搜寻列宁的文稿，结果在他1915年的论文中找到一篇。列宁在这篇文章中，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观点着眼，预见到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只能在一个国家发生——列宁未指明哪个国家——而不能立即具有国际性。斯大林抓着列宁的这一思想，把它提高到指引苏维埃俄国当前航向的重要位置。

1924年4月，列宁逝世三个月后，斯大林在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高级党校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说，在这些演说中，他巧妙地把他们称之为列宁教导的精髓概括起来，并且断然地用它来反对他的敌手的学说：

根据列宁的教导，革命首先要在俄国工农本身吸取力量。按照托洛茨基的说法，我们就得认为：这一不可缺少的力量，只有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革命中才能找到。那么，假如世界革命注定了要姗姗其来，那么该怎么办呢？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吗？

托洛茨基没有给我们任何希望。……根据他的说法，我们的革命只有一个前景：在等待世界革命的时候，在自身的矛盾中勉强生活，最后连根烂掉。

斯大林坚决认为，在西方发动一系列类似的革命之前，建设和巩固苏联已经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但是可能的，甚至是必需的。试图把无产阶级革命扩展到其它国家，这会是一场赌博，因为它将招致外国新的干涉，危害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的生存。斯大林结束他的论点说：布尔什维克能够追求的唯一合理目标是：

巩固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用它做推翻一切国家资本主义的基地……谁否认在单独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假如他还有逻辑性的话，就必须同样否定十月革命的适宜性。

1925年3月，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宣布斯大林的理论为党的正式路线。斯大林用这一方法赢得争夺最高权威的又一轮胜利，他不但使自己进一步成为列宁的化身，而且使自己牢固地成为应予重视的党的理论家。苏维埃共产主义由起初那种崇高但颇具乌托邦意味的国际主义目标转向今天这种民族共产主义方针，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是这个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对抗不断革命

在反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斗争中，斯大林揣度党的领导人的情绪，比他的对手较为深切。有许多人基本上同情托洛茨基继续布尔什维主义英雄时期的立场，他们也都在自

问：残破不堪、遍地饥荒、精疲力竭的年轻苏维埃国家，是否由于采取这一冒险的道路而再次为自己招致灾难。而且不断革命的政策又违背新经济政策的这些意图：恢复国家元气，吸引外国投资，同外部世界扩大贸易，为苏维埃取得外交承认。除了这些以客观考虑为根据的论点外，还应加上以心理为根源的论点。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然而却相当微妙、高度推想的理论，究竟能打动谁呢？肯定它既不能打动苏维埃的工农群众，也不能打动官僚机构的成员，其中很多人都具有狭隘的地方观念。人们刚刚从连续7年的长期残酷考验和痛苦岁月中挣脱出来，大家都一心一意想巩固他们得到的利益：

8小时工作制和土地，至于跻身苏维埃机关的人，则是巩固他们所获得的权力地位和声望。这样一种类型的复杂理论，只能引起具有国际主义胸怀的知识分子的共鸣，而在迅速发展并且大都是由工农群众和他们的子女构成的党内，知识分子只是很小的一群。

另一方面，托洛茨基的立场是把俄国的命运放在外国人的手中，即使他们是共产主义者；而这种立场的含义是俄国人民要依靠外部世界，不能“自行其是”。托洛茨基由于说俄国不能单独建立社会主义而在心理上处于不利地位。这使得他的对手能够把他说成是个冒险家，准备为了在国外扩展共产主义的目的而浪费俄国的资源，同时却忽视国家的恢复和发展，而由于执行新经济政策的结果，国家的恢复和发展当时正在顺利进行。斯大林断言，社会主义能够在甚至与外界隔绝的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从而在心理上取得了有利的地位。到1924年，甚至那些最热衷传播党的福音的积极分子，也已厌倦共产主义的冒险主义，不耐烦等待早就宣

布的世界革命。因此，斯大林关于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同他们的感情比较合拍：这有助于他们恢复对自身成就的自豪和自信，认为这种成就的继续存在无需依靠外界的事件，只需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资源。托洛茨基的论点说，他的对手缺少革命热情；对这种论点，斯大林则可以回答说：托洛茨基把俄国革命的最终命运寄托在外部援助上，是对俄国革命的前途缺少信心。

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在四海一家的原则或“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名义下完成的。然而，民族主义的潜流早已开始重新出现。斯大林虽然是一个俄罗斯化了的格鲁吉亚人，却比布尔什维克党的任何其他领导人更好地意识到这一趋向，并成为它的发言人。他提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就是在促使他的同胞不要依赖世界革命。他争辩说，即使世界革命推迟了，俄国也能够发展它自己那种牌号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种自力更生的宣传对俄国人有着深刻意义，因为它支持了他们潜在的、然而却是强有力的民族利己主义。

从历史的观点看，这两个对手之间的真正分歧，并没有当时反映在他们的公开言论中的那么大。托洛茨基并未主张放慢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步子，把苏联的全部资源用于促进国外的革命。恰恰相反，他那时的国内计划比他的对手雄心更大，并且还批评循序渐进的新经济政策。同样，斯大林也没有主张放弃苏联外部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他只是主张必须首先把苏俄建成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坚实可靠的基地。因此，他们的分歧实际上并不大，可以降低为时机、措辞和重点方面的分歧。所以，他们是能够和解的——如果存在少许相互信任和善意的话。使重新和解成为不可能的原

因，与其说是思想分歧，不如说是气质方面水火不容。他们贪图同一个目标，而又彼此藐视。他们是属于不同星座的两颗明星，两头不能同穴共处的雄狮。这一个必须毁掉那一个。

斯大林的权力基础

历史学者往往沉迷于充满戏剧情节、色彩丰富的事件，容易把权势人物间的激烈冲突渲染上浪漫气息。斯大林与托茨洛基斗争的情况也大抵如此。抛开才智迷人的理论争论，抛开两个人性格上互不相容的冲突，剩下的往往就是争夺权位的卑鄙而无情的欺骗，幕后的策划和阴谋。托茨洛基相信口头或书面语言的力量，而斯大林则主要依靠组织和对党的机关的控制。斯大林比他的对手早得多地体会到最重要的权力所在是党，党最终控制国家官僚机构、武装力量以及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秘密警察。斯大林在1922年春季成为总书记，从这时候开始，他便竭力暗中破坏托茨洛基在两个部门的地位，首先是政治局，其次是国防人民委员部，托茨洛基在这两个部门都掌握着权力。

我们已经看到，在七人组成的政治局中，这一努力由三头政治的形成而获得成功。这里还未加以说明的两个政治局委员是李可夫与托姆斯基。他们比较同情新经济政策体现的温和路线，因此同情“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结果在这主要的制定政策的机构中，托茨洛基越来越孤立。如果托茨洛基接受了列宁两次要他担任的付主席职位，可以有把握说，他就会作为苏联行政首脑而成为列宁的当然接班人。这将加强他

的地位和威信，并在某种程度上抵消斯大林日益增长的影响。但是，托茨洛基害怕承担新的行政责任，这就使斯大林得以使当时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阿列克塞·I·李可夫在这一关键职位上成为列宁的继承者。斯大林用这个方法使李可夫在关键性的政治局中加入他的联盟，进一步削弱和孤立了托茨洛基。①

1924年冬，斯大林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已经令人生畏的地位。他的专断、傲慢和沙文主义，不再有列宁的监督和批评。作为总书记，斯大林通过提拔干部不断加强对党的工作的控制，通过李可夫，他对政府事务和国家机构的日常工作也有了强大的影响，无论如何，这些工作最终都要受党的监督。

列宁的遗嘱

1924年5月，向中央委员会委员大声宣读列宁的遗嘱，这时争权斗争的决定时刻之一到了。斯大林坐着一言不发，列宁请求将斯大林调离有影响的总书记职位，使他狼狈不堪；他确实提出了辞呈。但是，托茨洛基再次没有采取行动，失去了排除斯大林的最后机会。季诺维也夫作了一次发

①在列宁生病期间，加米涅夫一直主持人民委员会，斯大林提出建议，由于他的犹太血统而未给他这个职务。斯大林的建议很早暴露出他的反犹偏见，他是这样说的：“我们必须考虑俄罗斯的农民特点”，李可夫是有着浓厚农民背景的俄罗斯人。

言，听起来似乎是代表整个政治局的意见，于是救了他的盟友。季诺维也夫提到遗嘱和当时以“对列宁的誓言”著称的斯大林的悼词，宣称：“我们可以愉快地说，列宁担心的有一点已经证明是没有根据的。我指的是关于我们的总书记的那一点，你们所有的人都亲眼看到过去几个月中我们和谐的合作……”中央委员会决定不公布遗嘱，并让斯大林保持他的职位。②

列宁逝世后不久，根据斯大林的倡议，政治局决定开展一个发展党员的运动。结果吸收了新党员20万，党扩大了约三分之一。表面上，这次运动是为了加强党的工人阶级成份。事实上，控制着吸收新党员工作的书记处确保只有斯大林的支持者才被接纳。结果，他对党的控制甚至更加强了。

他的两个主要盟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渐渐明白：斯大林一直在取得进展，不是他们在利用他，而是他在这场赌博中利用他们作为小卒。正当斯大林的这两个主要盟友在重新考虑同这位越来越权力无限而又傲慢的总书记联合有什么价值，并开始探寻同他们的所谓敌人和解时，托洛茨基又犯了另一个严重错误。1924年秋，他发表了名为《十月的教训》一书。他以他一向具有的锋利无比的才华攻击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说他们只是极其勉强地支持列宁武装起义的计划，因此是“失败主义者”。斯大林抓住了这一机会，出来支持他的盟友。他谈起托洛茨基1917年以前和以后的经历，特别是他和列宁的分歧。结果，托洛茨基不但未能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争取过来，拆散斯大林在政治局的多数，反

②在1956年以前，遗嘱未在苏联公布。